



容闳 (1828–1912) ,
广东香山 (今珠海) 人。

容闳 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

中山大学校园矗立着容闳、孙中山等近代中国十八先贤的铜像。西装革履的容闳站在那里，掌心里托着一粒正在萌芽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尤其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浪潮，我们越发感到容闳掌心里那粒种子的份量。

大河转弯的地方形成了沃野千里的“冲积平原”，小河转弯的地方则留下一块块滋滋冒油的“河湾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之河在近代转弯的地方，我们以为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鸦片战争前的香山县，鸦片战争后的香港和新安县（今深圳）。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的结果是，这里产生了一批以容闳为代表的影晌或改变中西方世界格局的杰出人物。中山大学校园矗立着容闳、孙中山等近代中国十八先贤的铜像。西装革履的容闳站在那里，掌心里托着一粒正在萌芽的种子。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尤其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浪潮，我们越发感到容闳掌心里那粒种子的份量。

鸦片战争之后，从铁屋子里醒来的炎黄子孙开始探索师夷制夷之术，强国富民之道，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勇于向西方学习，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期开始的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和引进“制器之器”，标志着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兆始；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派遣幼童出洋肄业，标志着对“夷夏之变”观念的突破；容闳1895年末归国后提出的“新政策”，以及后来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则把仿效欧美国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19世纪中国兴起的三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中，容闳一直是倡导者、推动者、实施者，甚或领导者。他满腔热情地从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光明磊落事业，同时痛感“过渡时代”的悲剧在于：“固不在于喜新，亦不在于守旧，独患其不新不旧，可新可旧。非但新旧相攻，抑且新旧自为政。积弱不振之原因，实由此辈乡愿行同鬼蜮所酿成，遂有如今之一日也……”

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英雄，容闳身上体现了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推许的所谓“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三重美德。当改良中国的最后一次努力幻灭后，容闳开始倡导暴力革命，先后参与庚子自立军之役、庚子惠州三洲田（今属深圳）之役以及大明顺天国起义，协助孙中山制订“中国红龙计划”，推翻清政府，“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直到临终前夕，容闳才看到来自故国的一缕曙光，为之欢欣鼓舞不已。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出身寒微的容闳7岁接受西方教育，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8年（1847~1854年），得以广泛系统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痛感于故国的落后和黑暗，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

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因此，在容闳的心中，

“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的观念一直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这就是他在自传中所明确表述的一段话：“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



中山大学校园内的容闳雕像。

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一代，能像自己一样出洋留学，获得先进的西方教育，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正是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初步酝酿了他致力于西学东渐教育、以期振兴中国的计划。

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次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翻译处和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并于1860年前往天京（今南京），向洪仁玕提出了振兴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的七条方案，但是这些建议未被采纳。

太平天国之旅令他终生难以忘怀，直到垂垂暮年还在思考有关太平天国的问题，并在回忆录中专辟一章《对于太平军战争之观感》，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明确指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纪律松弛和道德堕落；断言太平天国式的农民革命，既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也不能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尽管这样，容闳并未全盘否定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正如他所言：“这次叛乱的惟一良好后果，就是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

购买“制器之器”，创设江南制造局

作为一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容闳从骨子里否弃“政以贿成”的清政府，曾经寄希望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天国，一旦认清

了太平天国的实质，他就感到改造中国的动力也许来自清朝统治集团内部。

1863年容闳入曾国藩幕。容闳知道，在镇压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中，曾国藩是最早购买洋枪洋炮的清军将帅，他向曾国藩直言相告，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创设一个只适于制造来福枪的机器厂，而是要建设一个能适用于制造来福枪、大炮、弹药以及其他各种专用机械的机器厂。曾国藩全权委托他购买“制器之器”，聘请外国工匠，要求他详尽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

1863年冬容闳赴美订购“制器之器”，1865年春天，订购的机器全部运抵国内。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建，有丁日昌收购的旗记铁厂的全套设备和容闳采购的“制器之器”，两部分较为先进的机器合在一起，“其中各种紧要机器工程，无不全备”，弥补了以前机器不齐全的缺陷。到19世纪末期，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了。

作为一个目注全局的中国近代化实践者，容闳认为实业计划和教育改革同样重要。他于1867年6月在上海发起筹组华商轮船公司，并且草拟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个章程多达16款。

容闳草拟的这个章程，是代表华商提出的第一个民营轮船公司方案，它在集股、管理、分红诸方面仿效资本主义企业形式，试图通过发展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打破洋商对这一领域的垄断。

当局对于容闳创设轮船公司的条陈似乎看重并有所实施，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大员才意识到“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的重要性。1872年，李鸿章以北洋大臣的名义筹办“轮船招商十九事宜”，并把这个以吸收民族资本创办的民营航运企业定名为“招商局”。筹建“招商局”的朱其昂在拟定该局第一个章程时，把容闳五年前提出的章程作为重要借鉴文件，声明“传循往年许道声、容闳建议”，由官方设立招商局，招徕依附洋商名下的在沪各省股商的资本。1873年，招商局成立甫及两年，李鸿章就在给朋僚信函中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倡导幼童留洋教育

域外文明的引进往往遵循：器物—观念—制度三部曲，购买“制器之器”属于器物文明的引进，容闳最着力的一直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捷径。“客卿”蒲安臣率中国使团与美国缔结中美《续增条约》，也就是所谓《蒲安臣条约》。清廷假手“客卿”签订的《蒲安臣条

约》，更是使他感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已成为燃眉之急，该条约第七款“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保证。容闳深知实现自己的宏大计划，必须借助曾国藩、丁日昌的权势。丁日昌赞同留学教育计划，要他写成书面条陈由自己呈递总理衙门采用。容闳回上海，撰制条陈四则，寄呈丁日昌，由他转寄北京。容闳在条陈第二条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但是，这一建议并未获及时采纳，直到1870年容闳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处理天津教案，重提幼童留学教育，经曾国藩、李鸿章专折会奏，奏旨允行。容闳喜不自禁地写道：“予闻此消息，乃喜而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此乃予之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1872年~1875年间，四批留美幼童120人（其中一人为新安县人）陆续赴美，陈兰彬、容闳首任正副监督。为使留学事业不至中辍，容闳还请准李鸿章在哈特福德克林街建筑中国留学生事务所。



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

容闳开始招收首批幼童留学生时，国内尚无一大型中文报纸，无从稽查时人对幼童留美一事持何看法。直到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等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才在上海创刊。《申报》极为关注幼童留美事件，先是刊出首批留美幼童名单，其后刊发题为《拟西学生赴美国肄业事宜议》，并于同治十一年七月二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拟西学生赴美国肄业事宜议》的“社论”性文章，略谓：“上海西学局之设，前由节相曾文正公创议奏准，妥酌章程，其用意至为深远，其立法至为精详，诚自古以来所未有之盛举也。”

幼童留美开中国近代官费留学先声，同时也开启了自费出洋留学先河。据帮办挑选幼童出洋肄业的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同治十二年癸酉……第二批官学生三十名赴美留学，五月十八日放洋，黄平甫（胜）亲家带往；申港两处另有学生七名，自备斧资同往”。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的转变。推动这种观念

转变的当然是容闳。留学幼童精进好学，努力接受西学教育，但在国内顽固派的干扰之下，1881年清廷下令撤销留美幼童计划。对于留美幼童撤回一事，郑观应等洋务分子深表惋惜，他在《赠驻美国副使容纯甫观察》一诗中写道：“采采芙蓉涉远汇，中西学贯始无双。应嗟匡济稀同志，却羡科名隶美邦。鹏运八紘风在下，龙文百斛鼎能扛。诸生海外将成曲，底事吴儿换别腔。”近代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时任驻日本使馆参赞，悉心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深知留学教育为日本近代化提供了人才保证。被遣归国幼童途经日本时，他曾作纪事长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哀叹清政府此举将关系国运兴衰。

容闳在回忆录中哀叹说：“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可行的办法。随着中国留学生事务所的突然撤销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120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了。”但在日后的岁月里，留美幼童在各自的领域戮力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同时也修补或重建了被摧毁的容闳留学教育纪念碑。他们中间出现了被人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吴仰曾、邝荣光、唐国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蔡廷干、徐振鹏，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外交官唐绍仪、梁诚、梁敦彦等杰出人物，唐绍仪还出任过中华民国首任总理。

呼吁政治体制改革

甲午战争失败后容闳受命归国，对张之洞提出若干解救甲午战败后之倒悬的良策：为了使中国恢复声望，成为一个强国，应该采取新政策。中国必须开始采取行动，并且至少要聘请四位外国人士作下面四个部门的顾问——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他们的任期可定为十年，期满可聘请连任。顾问必须是具有实际经验、才能和品德毫无问题的人。聘请这些人在各任顾问以后，政府应采纳实行他们的建议。还要挑选一批年轻有为的学生在他们手下工作。这样可以使政府根据西方方式改革中国的行政机构，使它们根据西方的原则和概念进行改革。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论及法国大革命时曾经指出：“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至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辨认并趋之若鹜。”在晚清时期，曾国藩和张之洞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如果张之洞有曾国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即使

一时间不能实施“新政策”，也不妨婉言劝说容闳。但是，张之洞毕竟不是曾国藩——“不独无此言语，且无此之思想”。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容闳不愿坐视国破家亡，继续过那种“脱然无累，颇得自由”的寓公生活，陆续提出了创建中国银行、集股修建铁路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实业计划。

容闳的实业救国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人士的大力支持，最后还是在顽固势力与列强的干预下付之东流。但在康、梁等人酝酿变法初期，容闳并未详知其事，他说，我万没想到我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时，前些年在北京常见的康有为及其信徒梁启超正奔走于伟大的维新运动，它很快发展到高峰，成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梁启超对这位数十年来“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同乡前辈敬礼有加，视为“智囊”，每遇重大决策问题，纷纷来到他寓居的金顶庙讨教。容闳几乎参与了康、梁维新派所有重大活动的策划，并竭力影响这场运动的方向。“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其主要内容竟和容闳40多年的追求和实践大同而小异。

戊戌新政要求“变祖宗家法”，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受到了实权在握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慈禧太后集团从光绪皇帝推行“戊戌新政”之始，就加紧布置，开始反扑，策划政变。最后，“戊戌变法”以“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而告终，容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成了泡影。

同情暴力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意识到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已经腐败不堪，它不可能实行任何改革，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另谋良方。

1900年容闳开始由维新变法转向同情暴力革命，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真正为中国的进步开辟道路。得知兴中会和保皇党人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后，他极力支持。容闳同意出任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以消弭联合后的各党派之间的矛盾。7月26日，中国国会在上海愚园（又为张园）的南新厅宣告成立，容闳、严复分别当选正副会长。

容闳起草的对外文告散见于冯自由《革命逸史》、杜迈文等辑录《自立会史料集》、张之洞奏折等处。这则英文文告还有另一个中文版本：“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变苦境为乐境，不特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系我等义士所应为之责……”但是，自立军

起义失败，容闳“为中国造福，且为地球造福”的梦幻灰飞烟灭。

容闳当选“中国国会”会长和自立军准备起事的消息传到日本，孙中山颇为所动，决定离开日本，秘密回国，准备运动以容闳为会长的“中国国会”及其他力量。离日前夕，孙中山在横滨对送行者的谈话中称，其此行的目的系“去视察本国情势，并与本国同志进行种种磋商”。他还特别表达了对容闳的尊重和推崇：“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我并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月29日，孙中山甫抵上海，得知自立军起义已经失败，清廷正在大肆搜捕参与起事的国会会员以及自立军首领。鉴于大势已去，原定计划彻底落空，孙中山在沪上停留了两天，和容闳匆匆东渡日本，参与他制定的惠州三洲田（今属深圳）起义。

9月28日，孙中山到达台湾，伺机潜回香港，发动惠州三洲田起义。他在给刘学洵的信中特别强调，一旦起义成功，建立共和国，委派容闳、何启主持外交事务。但是，惠州三洲田起义转瞬之间灰飞烟灭，想抓枪杆子的孙中山未能在华南建立政权，容闳、何启未得主持“共和国”外交事务。

“舍忧国外无他思想”

庚子年的疾风骤雨彻底动摇了清帝国的根基。但是，慈禧太后挟带光绪皇帝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把“新政”要点和容闳提出的改造中国的系列计划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历史的进程呈现出曲线上升的势头。但是，清政府穷途末路之际推出的“新政”，无法扫荡笼罩神州大地的“亡国灭种”的阴霾，容闳从骨子里怀疑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正如他所说，“中国人善用计用策，观演戏自知。计策者，皆欺骗之事，此为中国各级社会相传之病。孔子有言，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欲动人不以诚，即有所动，为不诚之反照，非动也，乱也。”事实证明，不以诚信动人的清末新政步履维艰，它在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洋人朝廷”的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掘开了坟墓。一旦放弃改良计划，容闳就顺手操起一把铁铲子，开始充当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2年5月16日容闳乘“盖尔”号赴美。1903年春天，梁启超流亡新大陆，创设保皇党美洲支部，专程到哈特福德拜访容闳。梁启超为容闳留下一幅难得可贵的剪影：“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

在美国期间，容闳竭力促成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制订一个旨在推翻清政府的“中国红龙计划”，该计划包括“中国革命党应改变策略，暂停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尚在筹备中的小型起义，改为保存实力，集中人力物力，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由孙中山以‘中国同盟会总理’的名义，委任布思为‘海外财务代办’，负责与纽约的各大财团接洽贷款之事”等。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红龙计划”最终搁浅。1911年10月10日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12月19日，容闳在给谢纘泰等人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声；听从这种声音，你们就对了。”

谢纘泰把容闳给他的信函抄件悉数寄给孙中山，建议立即邀请容闳归国，并在附函中说：“我刚收到我们的老朋友容闳博士的来信，……我郑重建议你发电报邀请他回国。他能在制定宪法方面给你适当的帮助。”孙中山欣然命笔，邀请容闳归国辅佐政，“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该信全文如下：

容闳老先生伟鉴：

丁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遽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己也，即仆等亦尝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如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兹已二百六十余年，而教育之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自由平等之说，得毋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有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

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量亦不致掉头而我弃也。临风濡颖，不胜鹄盼之至……

躺在病榻上的容闳密切关注故国的政局，直到逝世前月余，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哈特福德沙京街284号寓所中，悄悄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4岁。容闳辞世的噩耗传到香港，他的生前好友谢纘泰在日记中写道：“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

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晚年切望回国，为祖国效劳。我们要说，容闳博士生不逢时。”而在容闳的故国，由于远隔重洋大海，翘首相盼的人们并不知道他已与世长辞。1912年5月3日，上海《民立报》刊登了一则题为《革命第一人》的启示，内称：容闳“数十年前主张平民政治，乃革命之实行家也”，“现尚避地海外，际兹共和国成立，亟应以全体国民诚意欢迎归国为后进指导。”

这则“启示”，变成了一首朴素的招魂曲——魂兮归来哀江南……

容闳大事年表

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贫苦农家，父名容丙炎，母亲林氏。

1850年：容闳入读耶鲁大学。他是耶鲁大学创校以来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

1854年：容闳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

1860年：11月19日，容闳造访太平天国，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七条振兴太平天国、改造中国的方案，但未被采纳。

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容闳向丁日昌递上“条陈四则”，首次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1872年：7月，容闳赴美国，为首批留学幼童安排衣食住行和就读学校。8月11日，首批30名幼童启程出洋，9月12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1875年：2月24日，容闳和玛丽·凯洛克在美国哈特福德市结为夫妻。12月11日，清政府谕命容闳为驻美国副公使。

1876年：耶鲁大学为表彰时任驻美副公使的容闳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00年：7月26日，中国国会在上海愚园的南新厅宣告成立，容闳当选会长，严复为副会长；9月1日，容闳赴日与孙中山纵论谋求强国富民之道；11月，容闳被清政府当作“要匪”公开通缉。

1909年：5月27日，康有为、徐勤派人刺杀刘士骥，导致了容闳与康有为保皇党的全面决裂。同年，容闳出版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1912年：4月12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沙京街284号寓所中逝世，享年84岁。

（刘中国/执笔）